

焦点关注

十三五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积极参与规则制定

■ 李果 王峰 报道

11月3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,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,促进全球经济平衡、金融安全、经济稳定增长。积极参与网络、深海、极地、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。

这也将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,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,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。

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

“中国对网络应用、技术开发、服务创新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发展潜力,因此需要让一些明确的、可预期的规则,成为国际网络治理体系的一部分,使中国未来网络空间朝着安全可信、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”,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李欲晓说。

“我认为,这里所谓的‘网络国际规则’,指的是网络空间行为准则”,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逸说。

沈逸认为,联合国2005年达成的“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”是新的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一个起点。“这个规则很简单,即不能让全球互联网事实上处于单一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下。说白了,就是网络空间是归一家管,还是大家一起管?”

2013年斯诺登事件发生后,美国宣布“放弃”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(ICANN)的“管理”。沈逸认为,这意味着“突尼斯议程”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“中国参与网络国际规则制定,就很具体地落脚在对ICANN管理上,中国的意见是什么”。



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所长陆峰认为,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包括网络标准、网络行为准则、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内容,同时又涉及在网络方面有无主权之争。由于中、美两国在互联网产业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优势,中美等大国是主要的博弈方。

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信中提到,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,本着相互尊重、相互信任的原则,深化国际合作,尊重网络主权,维护网络安全,共同构建和平、安全、开放、合作的网络空间,建立多边、民主、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。

沈逸认为,中国将会鼓励民间、非官方色彩的互联网公司、基金会、协会在全球互联网相关论坛上更加主动。他还认为,中国还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,“比如中国能不能向全世界提供海底光缆”。

李欲晓认为,网络空间带来了行为方式的变化、行为主体关系的改变,原来的行为规则也要进行调整,这就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,并形成新的机制。

他认为,习近平在访美、访英时达成的在网络安全、网络犯罪执法等方面的共识,这些双边讨论经过进一步拓展,也可能发展成多边的、国际间的规则,但需要一个各方尝试、推动的过程。

极地规则或将影响中欧新通道

极地规则,主要是指在南极和北极地区,各个国家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达成的一系列强制性规则。

一位曾经参与南极科考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对记者表示,中国在过去参与极地规则的制定方面涉足并不深,主要是“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方面还相对不足,无法支撑极地规则制定的需求”。

上述研究员认为,尽管中国在北极和南极不拥有任何主权权利,但国家在“十三五”期间提出要积极参与“极地规则”的制定,是基于现实局面的诉求。

从负面影响来说,随着全球变暖,由此导致两极冰盖消融可能会带给全球更多的极端天气,将进一步影响到农业生产甚至粮食产量的问题,因此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极地气候变暖的影响;从积极方面说,环境变化导致北冰洋从冰面融化,其适航的时间和渔捕季节也将大大加长。

而从国家正在进行的“一带一路”研究来说,未来的北极航道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海上

通道新选择,因为通过北冰洋,连接上海、纽约以及鹿特丹的航路,比经过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要短。

而从国际法来看,中国有参与北极地区国际治理的法律基础。作为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缔约国和1920年斯瓦尔巴条约签约国,中国有权享受北冰洋公海权益。

而在“十三五”期间,中国提出“积极参与极地国际规则制定”,则是希望影响国际社会对极地地区治理的方式。例如,1996年中国加入北极国际科学委员会,2007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,2013年成为该组织的正式观察员。尽管这种地位没有投票权,但能够获取北极理事会会议和各类活动的邀请,在参与这些活动时有机会影响决策过程。

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佳霖认为,适度原则将是我国参与极地规则制定必须遵循的原则。

韩佳霖称,适度的含义是指,在讨论如何利用规则的时候,不能突破“政治”和“主权”的界限,可在“技术”的范畴内予以规避。

韩佳霖称,要充分利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在环保的问题是把握好度,在合理开发的基础上积极保护,所有“禁止排放”的条款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数据支持。

进一步讲,我国与极地沿岸国之间的利用航道、开发资源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,为降低与其发生冲突的几率,可以采取以静制动的原则,根据自己的战略规划做好该做的外交斡旋和沟通合作工作,“比如从基础性工作做起,利用现有的法律文件和议事规则,根据现有条件,使极地规则带给我们的利益最大化”。

英国议员鲍威尔勋爵眼中的中国经济啥样

■ 周艾琳 报道

“当前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,所以不可能撇开中国不谈。在我看来,全球媒体每天都在谈论中国,不管我走到哪里,只要打开电视,几乎都会看到谈论中国的节目。”鲍威尔说。

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英,中英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大步迈进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也于11月2日发文提及,中英双边关系迎来“黄金时代”。然而,这种“联盟”在几十年前的“撒切尔夫人时代”似乎难以想象。令人好奇的是,今天的英国人究竟怎么看待中英关系以及中国经济?

近期,在2015复旦全球领袖论坛期间,英国上议院中议员、复旦管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查尔斯·鲍威尔勋爵(Lord Charles Powell)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专访。鲍威尔勋爵当年(即上世纪80年代前后)曾担任英国前首相马格利特·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、外交顾问和国防顾问,英国当时经历了巨大变革;眼下,现任首相卡梅伦掌管下的英国也正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的挑战。同时,他也可谓是几十年来中英关系发展的见证人。近年来,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,外媒频频报道“英国是在质疑声中拥抱中国”,但鲍威尔勋爵始终是中英关系的忠实拥护者。

中国应该更勇敢地推进改革

“几乎令每一届英国领导人后悔的就

是——没有更激进地推动改革。”这是鲍威尔勋爵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建议。其实,当年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进行国企改革也为中国提供了借鉴。

他回忆称:“1979年,英国社会、经济形势窘迫,罢工不断、失业率高企,撒切尔夫人几乎需要进行全面改革,包括改变经济运行模式,如使人们有能力买房,并采取减税、国企私有化等重磅措施,可谓是一次重大革命(revolution)。相比之下,其接下来的几任首相如布莱尔、卡梅伦就任的时候,形势更为有利。”

上个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已经陷入窘境,二战结束之后,英国形成了一种“中央集权、管理、官僚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”。撒切尔夫人面临国企效率低、财政压力大等问题。由于工党长期执行的集体主义(collectivism)经济政策失败,导致公共财政开支不断增加,而国有企业生产效益差,反过来加剧了这种危机。

当时,撒切尔夫人也认为“政府本身并没有钱,只有纳税人的钱”,因此必须削减政府的规模和公共支出。由此,撒切尔夫人将改革的大刀砍向了政府、工会、国企这样低效的组织。

尽管撒切尔夫人时代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企改革背景、经济问题都有所不同,但核心都存在一些国企的低效问题。

鲍威尔勋爵告诉记者,“1979年前后,英国的航空、房产等多数产业都是国有的,此后

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私有化,人们还需要适应和理解这一概念。我们也发现,私有化使得服务质量提高、成本下降,但如铁路等产业要进行私有化是很难的,不论是在美国、英国或是中国。”

谈到中国的国企改革,他也认为,中国已经下定决心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,“尽管改革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,但有些推进的速度可以更快,如国企改革,至少在一个旁观者来看,推动速度还不够快。”当然他也承认,中英的政治背景不同,全面的私有化(full-scale privatization)难以实行,“但中国可以做的是进一步弱化政府在国企中扮演的角色。”

亚投行行长选金立群就对了

其实,促使中英关系迅速升温的“催化剂”当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(下文称“亚投行”)。2015年3月12日,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,带头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,此后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七国集团(G7)国家悉数加入,当前G7国家中仅剩日本和美国没有“入伙”。

“首先,我认为你们挑选了一位非常称职的候任行长,金立群在英国非常有名,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;其次,我认为对于亚投行而言,需要保证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,使得该多边机构能够顺利运营。很显然,金立群在这方面拥有诸多专业经历,他曾就任亚洲开发银

行(ADB)副行长、投公司监事长等;此外,我们更希望看到好的投资项目,这种项目不应该是为了建立某种国家关系或有所倾向性,而是应该真正着眼有利全球经济的项目,这样才能取得各成员国的支持。”鲍威尔勋爵相信,美国和日本最终也会加入亚投行。

话虽如此,他也坦言,“但这一切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声,例如有英国媒体说‘英国似乎与中国走得太近了’,美国也有类似的质疑。”鲍威尔勋爵笑称,“我们的媒体自由化程度极高,什么都敢说。”

中国“溢出效应”有所夸大

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,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断加强。在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引发全球市场波动后,各大外媒也纷纷表示“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”。

“对此,我并不想给出非黑即白的评论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,全球不少国家的经济形势在8月前就已经非常疲软,欧洲经济增长始终很糟糕,美国复苏也不如预期的那么强,因此不可能将问题都归因于中国身上。”鲍威尔勋爵对记者表示。

当然,他也指出,中国在8月发生的波动的确让全球感到了紧张。“当前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,所以不可能撇开中国不谈。在我看来,全球媒体每天都在谈论中国,不管我走到哪里,只要打开电视,几乎都会看到谈论中国的节目。”

天津金改33条或近期出台 与北京错位发展

■ 李伯牙 报道

天津滨海新区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,天津金融改革33条将出台,目前文件已经成形,只剩一些细则的修改,或于11月下旬公布。

10月底,上海自贸区金改新40条【即《进一步推进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》】刚出炉,提出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、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内对外开放、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、不断加强金融监管和切实防范风险。

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官员、学者认为,此次天津金改33条虽然不直接针对自贸试验区,但其宗旨和改革方向相差不大。天津的金融业核心在滨海新区,尤其是天津自贸区,它肩负着金融创新改革的任务,因此金改33条的影响天津自贸区首当其冲。

“天津金融改革的设想和细则初稿与上海的新40条很接近,但有些内容还需要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批准。”知情人士告诉记者。

与沪自贸区金改内容方向一致

天津自贸区挂牌已有半年,金融创新是天津自贸区方案中的重点内容,也是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中对天津的重要定位。

在今年4月份公布的天津自贸区总体方案中,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是五大主要任务措施之一。方案中提到,天津自贸区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,增强金融服务功能、提升租赁业发展水平、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,具体包括开展利率市场化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,以及鼓励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内容。

此外,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天津的四个功能定位中就包括“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”。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在“2015·中国互联网金融研讨会”上表示,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提到天津要做“三区一基地”其中“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、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、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”三条都与金融密切相关。

在今年天津自贸区挂牌之后,出台了122条制度创新清单,其中就有47条包括金融创新。10月初,又推出第二批53条制度清单,其中8条涉及金融创新,主要包括探索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革、跨国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等。

“相信天津金融改革33条不会超越天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,因为自贸区的金融改革肯定是超过天津市的,有可能把自贸区的成熟改革措施扩展到滨海新区和天津市。”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程告诉记者,天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更为重要。

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,津沪金改并没有实质差别,宗旨和大致方向都一样,差别仅仅体现在细则支持上。目前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天津银监局,都已向总部提交天津市金改具



体细则,等待人民银行总行和银监会批准,才能正式实施。

京津金融错位发展

虽然天津金改33条即将出台,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也将天津定位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,但近在咫尺的北京金融业也很发达,

发改委:在国企国资改革等领域推出一批新举措

■ 刘丽靓 报道

国家发改委近日发文指出,要紧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结构调整关键期需要,在国企国资改革、完善市场体系等领域推出一批激活市场、释放活力的改革新举措,以改革带动全局,增强发展新动能。

国家发改委表示,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。国家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将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全委工作的重中之重,加紧推进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各项重点改革,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协调,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。一是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,出台了《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》,该《意见》即将启动试点。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稳步实施,通过推广特许经营、股权投资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,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运营,建立了PPP项目库,截至目前,已发布项目1043个,总投资1.97万亿元。三是价格改革迈出坚实步伐,大力推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,阶梯电价已在除西藏、新疆之外的全国其他范围内实施,阶梯气价在13个省份的50个城市实施,阶梯水价在26个省份的275个城市实施。四是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,全面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,相关配套文件将陆续出台;对石油天然气等其他重点行业改革,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方案。五是创新驱动发展和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有序实施,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,第一批选择2个省和62个城市(镇)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,在61个城市(镇)启动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,重点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、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、提高中小城市人口承载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。六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,全面规划、有序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以“六廊六路多港”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,推进合作双方重大项目建设;加快沿边开放步伐,研究制定了《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》。七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体制改革大力推进,除西藏、新疆、新疆兵团外其余29个省区市已上报车改总体方案,其中20个已批复;出台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件,即将启动第一批100多家试点。八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稳步推进,出台了《国有林场改革方案》和《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》,全面启动国有林场林区改革。

国家发改委表示,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,必须锲而不舍、坚韧不拔、持之以恒把改革推向前进。对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,要认真抓好落实,确保落地生根。要紧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结构调整关键期的需要,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,尊重市场经济规律,抓紧推进有利于改善供给和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创新,在转变政府职能、国企改革、完善市场体系、新型城镇化、对外开放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领域,推出一批激活市场、释放活力的改革新举措,以改革带动全局,增强发展新动能,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、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。

发展水平作为一条重大任务举措,支持各种融资租赁公司发展,为其提供众多政策便利和优惠。

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程认为,北京和天津在金融方面难免有竞争,不过依托融资租赁和保理业务,天津可以打开金融业的细分市场。在融资租赁方面,天津则占据2/3的份额。

前述知情人士表示,作为天津的金融业的优势,融资租赁和保理业务等内容在天津金改33条中自然少不了。

除了有自己的特色外,天津依靠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和较低的成本,也不断吸引金融企业前来投资设点。

天津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、滨海新区区委常委、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主任郑伟铭居于家堡和北京的金融街做比较,企业日常运营的成本金融街是于家堡的1.5倍,租金价格是8倍,商品房的价格是3到5倍,员工生活成本是1倍。

这对很多中小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,吸引力不小。此外,对一些创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,还有双创特区十条政策支持,包括资金、办公设备、人才引进、融资、激励企业上市、引导资金等有含金量的支持政策。

除了备受瞩目的金改33条,下一步天津还将发展有特色的金融业,比如滨海新区将出台政策文件全面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,与北京错位竞争。